

迈向跨喜马拉雅地区主义： 一种理论尝试*

朱源帅**

【内容提要】 跨喜马拉雅地区国家地缘相近、人缘相亲、文缘相通，政治上往来密切，经济上贸易频繁，人文上交流深入。建构跨喜马拉雅地区主义，有益于增进地区各国相互理解，推动各国发展战略对接，丰富国际合作内涵，共享地区发展与合作成果。自2015年起，中国先后发起并举办了“跨喜马拉雅发展论坛”和“‘环喜马拉雅’国际合作论坛”，由此，跨喜马拉雅地区主义逐渐从理念倡导转化为实践行动。然而，除了一位印度学者对跨喜马拉雅地区主义有所论述外，目前尚未有中国学者采用这一概念，更不用说对其进行深度理论阐释。为了弥补理论与实践的脱节，有必要从比较地区主义、“一带一路”和周边命运共同体等视角，对跨喜马拉雅地区主义作进一步的理论思考，从而为构建跨喜马拉雅命运共同体奠定理论基础和方法路径。

【关键词】 跨喜马拉雅地区主义；比较地区主义；南盟；“一带一路”

【中图分类号】 D814.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4-1508
(2024) 03-0119-18

DOI: 10.13252/j.cnki.sasq.2024.03.07

* 本文是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区域国别与国际传播研究”重大专项“区域国别视角下跨喜马拉雅地区合作机制研究”（项目编号：SCJJ24ZD76）的阶段性成果。

** 四川大学南亚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一、引言

2014年6月24日,时任中国驻印度大使魏苇在英文报纸《印度教徒报》(TH)发表《弘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推动中印关系迈上新台阶》一文,倡议“打造中印双引擎驱动的‘跨喜马拉雅经济增长区’”(a Trans-Himalayan Economic Growth Region)。^①这一构想随后得到中外学术界和智库界的响应。2015年8月,由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主办的首届跨喜马拉雅发展论坛在云南省德宏州举办。这次论坛的主题是“跨喜马拉雅发展合作与‘一带一路’倡议”,旨在“推进跨喜马拉雅地区合作,充分发挥本地区国家的互补优势,以中、印为双引擎驱动,进一步整合本地区国家的资源和市场”。^②在这次论坛上,印度国防分析与研究所研究员贾格纳特·潘达(Jagannath Panda)对“跨喜马拉雅经济增长区”构想做出回应,认为其主要关注“经济增长和贸易促进”,即首先关注经济层面。他提议,除了经贸议题外,我们还需要“从战略、人口结构的战略进行分析”,这些层面的重要性也不容忽视。此外,他还主张,“跨喜马拉雅经济增长区”不应只是一个“跨国性的框架”,还应该是一个“次地区或者地区级的项目”。^③由此,潘达不仅拓展了这一构想的内涵,而且还主张以次地区或地区尺度对其加以思考,这无疑为“跨喜马拉雅地区主义”概念的提出准备了观念基础。

2019年9月,在由云南省德宏州与云南大学主办的第五届跨喜马拉雅发展论坛上,印度观察家研究基金会(ORF)高级顾问查特吉(Rakhahari Chatterji)发表了《反思地区主义:中国—南亚跨喜马拉雅地区合作理念》,首度提出“跨喜马拉雅地区主义”(Trans-Himalayan regionalism)概念。查特吉在文中回顾了魏苇倡议的“跨喜马拉雅经济增长区”构想,认

^① Wei Wei, “Upholding the Five Principles,” 24 June 2014, <https://www.thehindu.com/opinion/op-ed/upholding-the-five-principles/article6142573.ece>, 5 September 2024; 魏苇:“弘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推动中印关系迈上新台阶”,2014年7月9日, <https://china.huanqiu.com/article/9CaKmJFd4f>, 2024年9月5日。

^② 彭波、杨明志:“共谋发展‘跨喜马拉雅论坛’恰逢其时”,《云南经济日报》,2015年8月27日,第A04版。

^③ 同上。

为这是中国首次提出建构一种由中国和印度领导的跨喜马拉雅地区主义。^①他承认，尽管“跨喜马拉雅地区主义的构想是由中国提出的，但包括印度在内的地区各国都将获益良多”。^②不过，他也指出，如果中国希望发挥牵头作用，推动跨喜马拉雅地区主义，就必须让印度参与进来。换言之，为了让该地区所有国家的人民都能繁荣发展，让地区主义理念成为现实，中国需要恰当地回应印度的关切。^③

其实，自2014年“跨喜马拉雅经济增长区”构想，以及2019年“跨喜马拉雅地区主义”概念提出以来，中国已经先后成立并举办了以跨/环喜马拉雅地区发展与合作为宗旨的两个论坛。除了自2015年以来在云南德宏举办六届“跨喜马拉雅发展论坛”（Trans-Himalaya Development Forum）外，还自2018年以来在西藏林芝举办四届“中国西藏‘环喜马拉雅’国际合作论坛”（Trans-Himalaya Forum F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④不难看出，通过这两个地区合作论坛的举办和推动，跨喜马拉雅地区主义已经逐渐从理念倡导转化实际行动。然而，除了印度学者查特吉之外，我们尚未见到有其他学者采用这一概念，更遑论对其进行理论阐述。为了扭转理论落后实践的状况，以及回应和发展查特吉的观点，我们有必要对跨喜马拉雅地区主义作进一步的理论思考。本文主要拟就比较地区主义、“一带一路”和周边命运共同体等理念，对于建构跨喜马拉雅地区主义的理论启发和方法启示，略作探讨，期能起到抛砖引玉之效。我们或可拭目以待：既然跨喜马拉雅地区主义的种子已经生根发芽，那么盼其逐渐开枝散叶，最终开花结果，就不是一种乌托邦式的幻想，而是一个具有现实性的理想。

二、比较地区主义：功能主义与建构主义之间

建构跨喜马拉雅地区主义，一个首先可以采用的视角是比较地区主义（Comparative Regionalism）。一般来说，比较地区主义意义上的“地区”

^① Rakhahari Chatterji, “Rethinking Regionalism: The Idea of China-South Asia Trans-Himalayan Regional Cooperation,” *ORF Occasional Paper No. 228*, December 2019, p. 11.

^② *Ibid.*, p. 20.

^③ *Ibid.*, p. 17.

^④ 关于“跨喜马拉雅”和“环喜马拉雅”两个概念的内涵及其关系，参见朱源帅：“何谓‘跨喜马拉雅’？——一个概念史的考察”，《南亚研究季刊》，2023年第4期。

(religions) 位于“国家”(national)和“全球”(global)之间。但是,到底是什么要素构成了一个地区?根据《牛津比较地区主义手册》的定义,“地区”不是一个客观的范畴,而是一种社会的建构。因此,可以将地区界定为“涉及领土位置和涉及地理相邻或规范相近的社会建构”。^①其实,地区兼具“自然”与“人为”、“客观”与“主观”双重属性:地区既可以被视为由主要地理特征明确界定的“自然”区域,也可以被视为其成员出于政治、安全或经济原因的社会构建,因此其边界并不是固定封闭的,而是开放流动的。

除了秉持一种中道的地区观,我们还需区分“地区主义”(regionalism)与“地区化”(regionalization)。有一种观点认为,“地区主义”是“在至少三个国家之间、主要由国家推动下建立和维持正式地区制度和组织的过程”;而“地区化”则意指“在那些地理相邻或文化相近的国家和社会之间加强经济、政治、社会或文化互动的过程”。^②另一种观点则主张,“地区主义”通常被认为是“一项由国家引导的工程,其目的在于通过特定的制度和战略来促成一种可界定的地理区域。因此,地区主义是一种自觉的、连贯的、自上而下的国家以及次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的政策,以协调世界某一特定地区的安排和活动”。^③相比之下,“地区化”则是指“个人和群体之间的跨国交往的物质模式——家庭联系和移徙模式、贸易和资本流动、跨界媒介应用等等——将一个界定松散的地理区域联系在一起的过程”。^④由此可见,与地区主义相比,“地区化在本质上是一个自发的、非自觉的、复杂的、自下而上的、通常是偶然性的过程”。^⑤

此外,在对地区加以概念化时,还存在着理性主义和“问题解决”导向的主流理论,与批评和建构主义的学术研究之间的差异。主流理论家通常认为地区是预先给定的,并经常将其定义为特定的国家之间由政策驱动的框架。由此,地区被认为是可以通过物质结构和正式的地区组织来辨认的。与此相对,建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认为,地区并不能从地区性的政府

^① [德]塔妮娅·A.博泽尔、[德]托马斯·里塞主编:《牛津比较地区主义手册》,耿协峰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7页。

^② 同上,第8—9页。

^③ Mark Beeson and Richard Stubbs, “Introduction,” in Mark Beeson and Richard Stubbs (eds.), *Routledge Handbook of Asian Regionalis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2, p. 1.

^④ Ibid.

^⑤ Ibid.

间组织方面得到最好的理解。从这种视角来看，所有地区都是社会建构的，因此在政治上是有争议的。这一看法的要点是政治行为体如何看待和阐释地区的观念、“地区性”（regionness）以及地区建构的概念。因此，世界上并没有“天然的”地区，所有地区都是（至少潜在地）多元多样的，其领土边界并不明确。^①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建构跨喜马拉雅地区呢？需要注意哪些相互依存性要素？是偏重经济、政治、安全要素？还是关注规范、观念、价值要素？抑或注重环境、生态、地缘要素？换言之，我们是采取“问题解决”导向的功能主义？还是观念/规范导向的建构主义？一个尝试性回答是：我们既强调地缘、生态的物质性或客观性相互依存或联结要素，也注重在此基础上建构一套观念性的构成要素。不过，我们最终还是要突破“客观”与“主观”的二元区分，坚持一种“中道”的思维方式。从根本上来讲，本文秉持的理论立场主要是建构主义的，即力图打破“事实”与“规范”、“功能”与“意义”、“客观”与“主观”等一系列二元对立范畴。这是因为，我们认为所谓“功能”与“意义”的区分，并非截然对立、水火不容，而仅仅是看问题的视角不同。如果从观察者视角来看，地区可以说是功能性的；如果从参与者视角来看，则地区主要是意义性的。为了突破新、旧地区主义观念的藩篱，我们坚持内外兼顾、参与和观察并重的双重视角：一方面，站在观察者立场，我们注重地区主义的功能性建构要素，另一方面，站在参与者的立场，我们强调地区主义的理念性构成要素。正是在内外两种视角循环往复的转换过程中，我们力求对跨喜马拉雅地区主义进行一种更完整、更全面的界定。概言之，在这里，我们将功能主义与建构主义的对立，转化为内外不同视角的差异，从而将这两种地区主义理论流派结合起来，进行理论和方法的调和。这种折中和包容的理论取向，恰恰是比较地区主义的一个基本立场。^②

我们还可以从驱动因素和行动逻辑两方面来分析地区一体化和地区主义。前者可以区分为内生驱动因素和外生驱动因素，后者可以划分为工具

^① Fredrik Söderbaum, "Theories of regionalism," in Mark Beeson and Richard Stubbs (eds.), *Routledge Handbook of Asian Regionalis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2, p. 14.

^② 参见耿协峰：“比较地区主义的研究议程与未来挑战”，《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21年第4期，第122页；Anja Jetschke et al., "Roundtable Discussion: Studying Asian and comparative regionalism through Amitav Acharya's work,"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Asia-Pacific*, Vol. 15, No. 3, April 2015, p. 5.

主义/理性主义行动逻辑和规范主义/社会建构主义行动逻辑。我们既可以采用这套分析架构，来探讨地区主义的动因和逻辑——工具主义偏向于经济合作，规范主义偏向于政治合作（意识形态、共享价值），也可以借用这套架构来分析地区主义所面临的障碍。一般来说，地区主义多是功能性合作，主要通过签署协议或制定规约的方式进行。功能性合作具有合作范围广泛、合作领域具体、合作目标明确和合作规则明晰等特点，因此合作效果大多较好。地区主义的构想和构建，通常基于现实的需要，一般是以问题为导向，由危机来驱动，从而促使地区各国从地区合作中寻求问题解决之道和危机化解之法。

具体来说，可将地区一体化和地区主义的动因分为两类：一是利益诱导型，二是危机驱动型。通常来说，前者具有稳定性和持续性，后者具有突发性和紧急性。两者的心理机制我们可称之为“趋利避害”原则。分而论之，前者是“驱利”诱导机制，后者是“避害”驱动机制。实际上，“利”和“害”是一体之两面，两者可以相互转化：“利”的缺失就是“害”，“害”的消除就是“利”。例如，地区性或全球性的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在这一点上表现得特别明显。此外，突发性危机引发的后果也可能是持久性的。比如，“亚洲水塔”急剧变化所产生的自然和人文后果就具有长期性和不确定性，需要跨喜马拉雅地区各行为体的持续关注和应对。在针对“避害”的地区合作和地区治理的持续进程中，地区行为体可从应对地区性共同命运难题，逐渐转化为地区性命运共同体认同。另一个例子是，“一带一路”实施的早期主要是发展导向地区主义，但随着建设的深度推进，其意涵日益扩大和丰富，从“趋利”诱发，逐渐扩展到包含“避害”驱动，将地区安全、生态等议题包容进来。由此，“一带一路”就逐渐从发展之路，扩展到安全之路、和平之路和绿色之路。概言之，功能性合作过程可以产生建构性身份认同。学界长期争论的功能主义和建构主义分歧，在比较地区主义视角中，既可以在时间维度上得以转化，也可以在视角转换中得到弥合。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比较地区主义还有一个从地区“合作”到地区“治理”转向的过程。随着地区主义理论的发展，特别是比较地区主义的兴起，原先以“功能性”与“非功能性”区分地区合作机制的做法已经不再适用，因为不管是经济发展、环境保护、疾病防控的合作，还是政治、安全和战略领域的互信，本质上都是地区体系下各功能子系统的合作。严

格来说，这种区分的实质是“政治性”与“非政治性”程度高低的区别，即地区国家主权让渡多少的问题。因此，可以说，在功能—结构主义系统论视角下，所有地区合作机制都是功能性的。为了克服功能主义和建构主义之间的张力，如前所述，我们还根据地区合作和地区治理的动因提出了另一种区分，即“利益诱导型”和“危机驱动型”。当然这也只是一种便宜的区分方法，二者其实是一体两面的关系。

作为一门学科，地区主义本身已经成为一个研究领域，因此，梳理跨喜马拉雅地区的经验知识，厘清跨喜马拉雅地区主义的一些关键理论辩论和争议，对于这一新领域的知识扩充和理论发展极为重要。同时，作为一种地区主义新尝试，跨喜马拉雅地区主义可以为比较地区主义提供一个典型案例，进一步推进其理论体系的完善和方法路径的扩展。从地区形成的内因外缘来看，理解地区主义有两种视角：一者是外生性视角，另一者是内源性视角。具体而言，地区主义既可以从外生的角度（由外而内）来理解，也可以从内源的角度（由内而外）来理解。前者指的是地区化和全球化是全球转型所造成的，而后者指的是地区化是由地区内大量不同因素所塑造的。^①

一般来说，传统的地区主义研究一直以欧洲一体化理论和实践为主导。而在有关比较地区主义的理论建构和比较讨论中，欧洲中心主义也在很大程度上占主导地位。不过，随着地区一体化和地区主义可能以多种形式出现的认识日益加深，欧洲中心主义立场越益受到各种新兴理论挑战。从比较的角度看，一个问题是，根据以欧洲为中心的观点，欧洲的地区主义往往被认为是多维度的和高制度化的，这不仅被认为是一种描述性事实，而且被认为是一种规范性价值。而世界其他地方的地区主义和地区一体化则被认为是低制度化的，并被简化为一种仅仅与经济或安全相关的现象。这种欧洲中心主义偏见难免会带来这样一个问题，即对欧洲地区主义性质的基本假设和理解，制约了其对世界其他区域的地区主义的恰当理解。对于非西方地区主义，大多数处方来自于对欧洲一体化的一种特殊解读，这种解读非常强调欧共同体/欧盟的地方性经验。^②

因此，我们需要超越以欧盟为中心的“欧洲模式”，借鉴亚洲地区主

^① Fredrik Söderbaum, “Theories of regionalism,” in Mark Beeson and Richard Stubbs (eds.), *Routledge Handbook of Asian Regionalis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2, pp. 12-13.

^② *Ibid.*, pp. 14-15.

义的典型案例“东盟方式”(ASEAN Way)^①,建构亚洲地区主义的“跨喜马拉雅方式”(Trans-Himalayan Way)。不过,我们要避免一种将欧洲地区主义和亚洲地区主义对立起来的思维方式。比较地区主义强调一种相互观照、互嵌并置的立场,并不以一种地方知识取代另一种地方知识,更不以一种特殊中心主义反对另一种特殊中心主义。^②

三、从“中国—南盟”到“跨喜马拉雅”： 一个地区主义新构想

在跨喜马拉雅地区主义的建构中,喜马拉雅地区占据着中心位置。从地理上来说,喜马拉雅地区存在着不同的地形,从高原到高山和山谷,再到较低的山麓和平原,每一种地形都代表着不同的生态、资源、社会基础和政治身份。从范围上来讲,喜马拉雅地区从最西边的阿富汗、巴基斯坦,经中国、印度、尼泊尔和不丹的山区,延展到最东端的横断山脉,处于南亚、中亚、东南亚和中国的交界处。这一地理位置使文化、贸易和人口流动得以从印度等国家向北进入中国西藏及内地,从中国西藏向南进入南亚及印度洋地区。由于横跨世界两个主要文化区域的边境,这一地区具有显著的跨体系性,它融汇了印度教和佛教以及当地的文化、语言和族群。^③正是由于喜马拉雅地区的链接,跨喜马拉雅地区成为了中国、印度等多个国家共处的区域。因此,地缘链接是跨喜马拉雅地区形成的地理基础。尽管地区各国在种族群体、政治模式、经济发展和文化类型等方面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但由于地缘上毗邻相接和历史上交流融合,尤其是因为政治上、安全上、经济上、社会上和文化上的互动关联和利益追求,跨喜马拉雅地区迫切需要建构并发展适应多元化需求的地区合作和治理机制,并探索成立地区化组织。

其实,早在1983年,南亚的7个国家——孟加拉国、不丹、印度、马

^① 关于“东盟方式”概念的源流及其内涵,参见〔加拿大〕阿米塔·阿查亚:《建构安全共同体:东盟与地区秩序》,王正毅、冯怀信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87—98页。

^② 关于比较地区主义如何处理地方性与普遍性的问题,参见魏玲:“全球转向下的比较地区主义发展”,《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21年第4期,第146页。

^③ Sangeeta Thapliyal, “Trans-Himalayan Region: Evolving Politics and Strategies,” *IIC Occasional Publication* 78, 28 January 2016, p. 3.

尔代夫、尼泊尔、巴基斯坦和斯里兰卡——就达成了一项南亚地区合作框架协议协议。两年后，经过进一步的规划和谈判，南亚地区合作联盟（SAARC）于1985年12月在达卡举行的第一次地区首脑会议上启动，以推进促进南亚地区和平与发展的双重目标。2007年，阿富汗被接纳为第八个成员，至此南盟才容纳了南亚所有国家。然而，成立至今，南盟的进展十分缓慢，其在计划实施和地区体制安排方面的成就可谓微不足道。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南盟的“动荡的不成长”，加上南亚国家之间存在的相互敌视和信任赤字，不免让人怀疑南亚各国是否能够追求更深层次的地区合作，包括采取具体举措加强现有的地区安排和建立新的地区机构以实现互利共赢。^①

正是由于南盟止步不前，方有其他替代方案应运而生。例如，张蕴岭先生较早指出，中国与南亚合作的一个理想方案，是由“中国与南亚整体构建合作机制框架”。一方面，南亚地区早已建立南盟这一地区组织，同时也提倡建立南亚自贸区。另一方面，“中国希望与南盟建立合作关系”，并得到巴基斯坦、孟加拉国等国的支持，然而，作为南亚地区大国的印度从一开始就反对中国涉足南盟。不过，最终在其他南盟成员国的大力支持下，中国才在2006年与日本一起，被接纳为南盟的观察员国。因此，短期内“中国加入南盟几无可能，中国自身也不会考虑加入”。所以，“最理想的发展是与南盟建立‘1+8’（中国主持），或者‘8+1’（南盟主持）的对话合作机制”。^②

确实，对于中国与南盟的合作，尤其是中国加入南盟，一位印度学者就持强烈的反对意见。首先是强烈质疑中国的南亚属性：中国能否仅仅因为与南盟国家地理位置相近而加入南盟？这名学者认为，无论在地理上、历史上还是文化上，中国都不是南亚的一部分，而是属于东亚。^③ 其次是无端揣测中国加入南盟的动机：如果地区合作的逻辑是为了让南盟更有意

^① Kishore C. Dash, “Dynamics of South Asian regionalism,” in Mark Beeson and Richard Stubbs (eds.), *Routledge Handbook of Asian Regionalis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2, p. 406.

^② 张蕴岭：“中国的周边区域观回归与新秩序构建”，《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1期，第19页。

^③ 与此相反，有学者将中国视为事实上的南亚国家，而缅甸因为其曾为英属印度的一部分，也被视为具有南亚属性。参见 Stephen P. Cohen, “India and the Region,” David M. Malone et al.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Indian Foreign Polic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hapter 25,” 2015, p. 424.

义,那么中国有更多的理由将南盟推向无意义的处境。一是随着地理上的过度扩张,南盟将成为一个矛盾重重的综合体。中国的领土范围是南亚领土总和的两倍多,中国的加入会打破南盟的现有格局。二是随着中国的加入,问题可能不再以南亚为中心,而是以中国为中心。三是中国的政策是通过与南亚次大陆国家建立不同层次的关系,在南亚地区遏制印度。概言之,随着中国获得了一个新的平台来发挥其能动作用,南盟内部的力量平衡会发生变化;而印度在南盟内部的领导力和主动权,将会因为中国的加入而被大大削弱。因此,这两个亚洲巨人之间的持久竞争只会使南盟的目标脱轨或放缓。^①对于中国加入南盟的可能性,也有中国学者不抱乐观态度。龙兴春先生就指出,虽然南盟成员国如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和尼泊尔等,都积极推动中国加入南盟,使其成为南盟正式成员国。不过,这些国家的真实意图是通过“拉中国平衡印度对南盟的影响,摆脱印度在南盟内一家独大的局面”。^②众所周知,这种局面正是印度想方设法要竭力避免发生的。因此,“如果中国在巴基斯坦等国的推动下谋求成为南盟正式成员,则肯定会遭到印度的反对而成为不可能”。^③退一步说,即使中国勉强加入也必然会遭到印度的猜忌与不合作而难以发挥作用,更可能因为涉入南盟内部的纷争与对抗,从而不利于南盟的发展和与中国与南盟关系。更为重要的是,到目前为止,“南盟区域合作本身乏善可陈,中国加入的实际作用也不大”,因此,中国不如“以务实的态度推动实质性合作”。^④

对于印度反对中国加入南盟、抵制中国“渗透”南亚,我们可以从历史与现实两重原因加以分析。一方面,从历史原因来说,“横亘在中印间的青藏高原和喜马拉雅山脉将中印两国分割为相对独立的地缘体,长期以来,双方力量都难以逾越,从而形成天然的地缘政治空旷区”。^⑤不过,随着现代交通、通信、军事技术的发展,青藏高原和喜马拉雅山脉对于中印两国的屏障作用将日益降低。由此,导致“地缘政治空旷区因自身抵御外

① Bhartendu Kumar Singh, “SAARC Expansion and China,” 16 April 2007, http://www.ipcs.org/comm_select.php?articleNo=2266, 5 September 2024.

② 龙兴春:“试论中国与南盟多边合作的机制与进程”,《南亚研究》,2009年第4期,第3—4页。

③ 同上。

④ 同上。

⑤ 熊琛然等:“印度领衔下的南亚地缘政治特点及其对中国的启示”,《世界地理研究》,2016年第6期,第45页。

来力量的脆弱性而成为地缘政治脆弱区”。^① 另一方面，从现实理由来讲，中印间的尼泊尔与不丹在“喜马拉雅山脉—西藏地区”地缘带上占有重要位置，北上可进中国腹地，南下能穿印度“心脏”，在中印边界争端中也具有支点作用。印度极力监控尼泊尔和不丹、抵制中国“渗透”正出此因。^②

此外，我们还可以从南亚地区本身的地缘政治格局，来理解印度对于中国与南亚合作的“焦虑症”。虽然南亚次大陆在地缘上是整体性的，然而，南亚国家在地缘政治上却是碎片化的。“从地区权力结构上看，南亚国家间在相互依赖中形成了以印度为‘权力中心’的不对称关系；从区域合作机制上看，因印度与南盟其他成员国间的利益分歧，致使南亚区域合作联盟‘合’而难‘作’、‘联’而不‘盟’；从地区安全问题上，印度几乎与其周边所有国家都存在着分歧与争执，尤其是印巴之间始终存在的具有‘亚洲地缘政治火山口’之称的克什米尔归属问题。”^③ 概言之，南亚地缘政治构架整体上呈现出以印度为中心、以南亚其他国家为边缘的“核心—边缘”格局。^④ 因此，不难理解，当中国与南亚其他国家进行正常合作时，常常被印度认为是“侵入”其势力范围，从而引起印度的极度焦虑与高度警觉。

那么，如何突破这种印度式“门罗主义”思维定式，并冰释印度的战略疑虑呢？一个可能的回答是：我们或许需要跳出以中国为合作一方、以南盟为合作另一方的“中国—南盟地区主义”旧框架，^⑤ 建构一种以跨喜马拉雅地区各国为平等参与主体的跨喜马拉雅地区主义。首先，我们需要对效仿“东盟方式”来建构“南盟+中国”合作模式的不足有清醒的认识。所谓“东盟方式”，主要是指东盟成员国制定了一套非正式的准则来规范地区会议和谈判，贯穿于这一方法的一系列理念，如避免有争议的问题、鼓励非正式性、强调广泛协商、妥协、建立共识的重要性等，已成为东盟地区主义（ASEAN regionalism）的一个核心组成部分。^⑥ 我们当然可

^① 熊琛然等：“印度领衔下的南亚地缘政治特点及其对中国的启示”，《世界地理研究》，2016年第6期，第45页。

^② 同上。

^③ 同上，第39页。

^④ 同上。

^⑤ 参见杨思灵：“中国—南盟地区主义：建构及挑战”，《南亚研究季刊》，2014年第4期。

^⑥ Mark Beeson and Richard Stubbs, “Introduction,” in Mark Beeson and Richard Stubbs (eds.), *Routledge Handbook of Asian Regionalis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2, p. 3.

以在比较地区主义视角下，借鉴“东盟方式”的成功经验来建构一种新地区主义。不过，我们需要注意“南盟”与“东盟”有很大的不同：南盟主要是陆地相邻国家，多数国家与印度接壤，地缘上联系紧密；印度居于权力中心的格局；印巴关系持续僵持；区域组织化不高；域内国家互补性不强。相较之下，东盟各国在地缘上不如南亚次大陆那么紧密。尽管中南半岛上也有陆上邻国，但是各国在地理上很少被一个巨大邻国绝对主宰。东盟各国在体量和差异方面不如南盟大；等等。因此，我们需要另辟蹊径，探索一种新思路：突破“中国—南盟合作”旧思路，转向“跨喜马拉雅地区主义”新构想。其次，建构跨喜马拉雅地区主义，我们在国家与地区、中心与边缘的关系上要实现视角转换。一是从国家本位到地区本位的转换。二是从中心立场到边缘视角的转换。由此，各个国家原来的中心就散落为地区网络的一个个重要节点；而原来的“多国边疆”则转化为地区的“中间地带”。跨喜马拉雅地区也就不再是由边界划定的破碎区块，而是恢复为一个“跨体系社会”。^① 这一跨体系社会具有混杂性、流动性和整体性特征。通过这个既动态又稳定的体系，将地区各国的节点连接起来，形成一张多点联动的共振之网、一部多声复调的合唱之曲。最后，我们需要确立一种新的地区观：突破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眼光下的东亚、南亚和东南亚的空间区块分化，建构一个和合共生、命运与共的跨喜马拉雅新地区。通过新地区的建构，我们可以将喜马拉雅山脉南北两侧、东西两端的广大区域纳入其中，地区各国在这一空间进行合作与共治，以应对和解决地区共同命运难题。

其实，一般来说，“由于地缘更近，利益链接更直接，人文交流更密切，因此，在许多方面，区域的特性更强，大多发展起了区域组织或者合作机制，对区域进行更有深度的管理和治理。”^② 不过，跨喜马拉雅地区似乎是个例外，尽管有着悠久的人文交流历史，丰厚的利益交换基础，但或许主要是由于喜马拉雅山脉地理上的阻隔，或许是因为地区内一些国家间遗留下来的历史问题，以及政治上和安全上互相猜疑，本地区内的合作机制或地区组织很少已然建立，甚至可说是付之阙如。那么，我们应该如何促进跨喜马拉雅地区合作，并建构跨喜马拉雅地区主义呢？对此问题，学

^① 汪晖：“跨体系社会与区域作为方法”，《东西之间的“西藏问题”（外二篇）》，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

^② 张蕴岭：“对国际区域学理论的探讨”，《俄罗斯研究》，2021年第6期，第99页。

界目前已取得一些共识。第一，增进跨喜马拉雅地区各国的战略互信，用地缘文明取代地缘政治，积极探索共同发展经济的模式，把跨喜马拉雅地区各国的合作发展成为“南南合作”的典范。第二，将地区性议题放到国际层面来考虑，但由于区内国家、区外国家的利益不同，对两者应区别对待。第三，不仅需要地区各国中央政府的努力，更需要本地区地方政府的合作，尤其是位于喜马拉雅地区的各国边疆地区；第四，先从容易开展合作的领域着手，关注各方相关利益；以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为抓手，推动互联互通，促进地区一体化建设。^① 总言之，我们可以从共同利益议题或共同命运难题入手，然后逐步扩展到政治分歧、安全困境和信任“赤字”等其他高政治性议题上，以便开启一条比较容易的地区合作与地区治理之路，为最终建构跨喜马拉雅地区主义奠定坚实基础。

四、共建“一带一路”，构建跨喜马拉雅命运共同体

突破中国与南亚地区合作困局的另一个思路是深化“一带一路”建设，构建跨喜马拉雅命运共同体。^② 从空间尺度上来说，跨喜马拉雅命运共同体是我国周边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周边命运共同体则是中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先行试验区。周边是我国的“安身立命之所，发展繁荣之基”，^③ 如何处理好我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事关我国的生存与发展。不过，对于“周边”概念的相对性及其导致的身份认同差异，我们还需在概念上做些分疏。^④ 我们可以从三个层次来认识和把握“中国”与“周边”的关系。首先是“中国与周边”，即“从中国出发，如何定位和发展周边地区”，这是第一层次。其次是“周边与中国”，即“周边国家如何定位和发展与中国的关系”，这是第二个层次。最后是采取整体性视角，即“把中国与周边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在这种整体性视角下，“中国和周边国家共同构成一个共处、共生的地缘与利益区域，中国是其中的有机构

① 李涛：“推进中印‘跨喜马拉雅’合作”，《环球时报》2018年5月8日，第14版。

② 参见杨晓萍：“‘一带一路’与中国—南亚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当代世界》，2015年第11期；孙喜勤：“文明交流互鉴中跨喜马拉雅共同体的建构”，《南亚研究季刊》，2020年第4期。

③ “新时代中国的周边外交政策展望”，《人民日报》，2023年10月25日，第6版。

④ 许利平：“推动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理论、现实与人文交流的路径探索”，《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4期，第19页。

成部分”，这是第三个层次。^①从“自我”与“他者”眼光的投射视点来说，中国与周边可有三种彼此对待的态度。第一，从中国的角度定位与发展周边地区，即“从中国看周边”。以“一带一路”倡议为例，我国通过自主推动与投入，积极与周边国家展开合作，显著提升了周边地区的发展环境。第二，从周边国家视角定位对华关系，即“从周边看中国”。随着周边各国与中国的联系日益紧密，各国对发展与中国的关系给予更大的重视，把稳定和增进与中国的关系放在重要位置。第三，是基于“中国与周边”和“周边与中国”的双向认知，将中国与周边环境视为一个整体，即“中国与周边互看，实现视域融合”。在这一整体中，中国与周边国家构成了一个共存互利的共同体，双方应守望相助，共同打造有利于彼此的地区环境。^②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我们正是在最后一层意义上来理解“周边命运共同体”，只有这样，才能说跨喜马拉雅命运共同体是其重要组成部分。

在推进构建跨喜马拉雅命运共同体过程中，“一带一路”建设对于加固跨喜马拉雅地区共同利益基础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通过基础设施网络、物流网络、产业园建设，把各国的发展以更为紧密的方式连接起来。^③有学者认为，“一带一路”基本上属于地区经济合作机制，也就是说“一带一路”具有地区主义属性。^④“一带一路”的地区合作主要是经济合作，而跨喜马拉雅地区除了利益导向的经济合作外，还有一些更紧迫和棘手的难题需要地区合作和共治来解决。一个例子是，尽管中印贸易额在双边关系持续低迷的状态不减反增，但中印边界问题却导致两国整体关系的非正常化。“一带一路”主要是经济地区主义，然而，跨喜马拉雅地区除了发展不足外，还有气候变化、边界纠纷、恐怖主义、资源短缺等诸方面难题，因此除了发展导向性地区合作机制外，还需要建构以问题解决为导向的地区主义。

如前所述，跨喜马拉雅地区主要是由中国及其西南方位多个周边国家构成的地区，“一带一路”模式可以作为实现地区合作的一个方式。但由

^① 张蕴岭：“综合视角下的中国周边环境与周边关系”，《当代世界》，2022年第4期，第12—13页。

^② 张蕴岭：“新形势下推动构建中国与周边国家命运共同体”，《当代世界》，2021年第7期，第55页。

^③ 同上。

^④ 李向阳：“‘一带一路’：区域主义还是多边主义”，《世界经济与政治》，2018年第3期，第36页。

于本地区有着独特的地区属性和地区难题，在“一带一路”大框架下，我们还需要更具体和更细化的地区主义构想。为了促进跨喜马拉雅地区合作，构建跨喜马拉雅命运共同体，需要强调利益共享和责任共担、难题共克和问题共解，以及地区共治和各国共存。跨喜马拉雅地区联结了“一带”和“一路”，既是桥头堡，也是核心区。域内的中巴经济走廊是“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孟中印缅经济走廊本身就具有地区主义属性。^①东西两大走廊，以及印度东向发展与东南亚国家联通带来的成果，外加拟建的新藏铁路，最终会将喜马拉雅地区围绕起来。正在推进的中尼铁路，则横穿跨喜马拉雅地区的核心地带而将山脉南北的国家和地区连接起来。通过环喜马拉雅经济圈路线网的建成，最终联通跨喜马拉雅地区，由此各国的边缘转换为地区的中心，区隔的后方倒转为联通的前沿。孟中印缅与孟不印尼两个次区域合作的对接，可以将跨喜马拉雅东部区域联结起来，由此将尼泊尔和不丹两国完全涵括进来。而中巴经济走廊可向东西横扩，覆盖印度和阿富汗，如此可将跨喜马拉雅西部区域联结起来。中间则通过中尼印经济走廊，将喜马拉雅核心区域南北贯通。通过三大经济走廊的次区域联通体系的对接，最终实现跨喜马拉雅地区的全覆盖和全联通。

从跨喜马拉雅命运共同体整体性视角，我们需要重新看待三大经济走廊和一个合作倡议的重要意义。中尼印经济走廊的纵向联通，与孟不印尼合作倡议、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中巴经济走廊的横向联通，共同形成跨喜马拉雅地区经济圈。换言之，通过这些经济走廊和合作倡议，正好将跨喜马拉雅地区联结起来，而这需要整体性和地区性协调。中尼印经济走廊作为跨喜马拉雅核心区和中心区的纵向大通道，从地区一体化视角看，需要大力推进；不过这需要地区各国的共建共享，绝不能是某一国家的一厢情愿。“一带一路”虽然偏重于经济议题，但并不局限于地区经济合作，而且还包括生态、安全和文明等诸议题。因此“一带一路”不仅是繁荣之路，还是和平之路和绿色之路。^②跨喜马拉雅地区需要这些经济走廊建设作为前期准备，在打好物质基础上，拓展到地区合作和治理的其他议题上去，尤其是聚焦共同命运问题的解决。不过，经济走廊虽是跨喜马拉雅地

^① 参见张立、王学人：“从地区主义视角看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南亚研究》，2017年第3期。

^② 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编著：《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进展、贡献与展望》，北京：外文出版社，2019年，第47—62页。

区的一个重要基础，但往往受制于地缘安全问题而举步不前。因此需要着眼于地区整体性和议题全面性，来重新构想一种新地区主义。不过，在不同阶段，合作议题和共治难题仍可以有所偏重。

“一带一路”是发展导向的，同时具有地区主义属性，因此可称之为发展导向型地区合作机制或地区主义。跨喜马拉雅地区主义是对“一带一路”模式的地方化和具体化，是补充和完善。跨喜马拉雅地区主义属于何种地区主义的属性界定，事关跨喜马拉雅地区的合作机制、治理结构和建设路径。我们不仅要阐明建构跨喜马拉雅地区主义的必要性，同时也要分析其可行性，将理想追求和现实考量加以辩证融合。一方面，地区各国要坚持建构地区主义，甚至是地区命运共同体的高远目标；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清醒认识到实现这一目标的诸多现实困境，以及需要投入的精力和时间的持久性。

在跨喜马拉雅地区，“亚洲水塔”变化导致的共同命运问题，是真正的命运共同体问题。因此，跨喜马拉雅命运共同体的构建，首先需要解决这样的地区共同命运问题。在阿查亚与布赞所倡导的全球关系学视角下，当下的“环境管理恐怕是联结中心地区与外围地区的终结共同命运议题 (shared-fate issue)”，因为“不管在财富、权力和文化上有何差异，全人类共享一个地球；如果自然环境以某种方式发生变化或被破坏，我们都将承受后果”。^① 两位学者这一论断，尤其适应于跨喜马拉雅地区的生态环境危机。这是因为，“生态环境是最具有外延性、扩散性和共同性的因素。也就是说，一国的环境可以外延到国外，影响他国的环境。同时，环境问题还具有更大的扩散力，局部的问题可以扩散到更大的区域。因此，环境问题是区域各国共同的问题。”^②

从动因类型来讲，跨喜马拉雅地区合作主要存在四种现实驱动力：一是安全威胁，二是经济危机，三是生态环境问题，四是身份认同连带。可见，地区合作大多是危机或难题驱动的，基本上是属于问题导向型地区主义。以难题或危机为导向，进行地区合作与地区治理，是一种比较普遍的建构地区主义的方法和途径。这是因为非政治或低政治的合作，可以凝聚政治共识和累积地区认同，从而有助于地区合作向更为全面的领域延伸和

^① [加] 阿米塔·阿查亚、[英] 巴里·布赞：《全球国际关系学的构建：百年国际关系学的起源和演进》，刘德斌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216页。

^② 张蕴岭：“关于国际区域治理的思考（五）”，《世界知识》，2022年第12期，第70页。

推进，并最终构建起一种地区命运共同体。构建跨喜马拉雅命运共同体，正是为了解决地区性公共问题，追求地区性共同利益，应对地区性危机，解决地区性难题，以及共同管理地区性事务。总言之，其追求的目标是事务共治、责任共担、利益共享、环境共保和生态共护。

不过，构建跨喜马拉雅命运共同体，最主要目的还是追求地区共同安全和共同发展。这关涉到和平与发展两大主题，只是这两大目标有时并不能很好地兼容，因此有“发展导向地区主义”和“安全导向地区主义”之分。如前文所言，从心理驱动机制来说，就是“趋利避害”。不过，追求安全或危机驱动型地区主义，在各个地区又有不同，因为安全可分为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根据所追求的安全目标和所感知的威胁来源不同，又可以分为各种危机驱动的地区主义。在跨喜马拉雅地区，则是两种安全威胁交互并存。一方面跨喜马拉雅地区是热点地区，如存在印巴关系、阿富汗问题和中印边界争端等；另一方面，跨喜马拉雅地区也是非传统安全丛集地区，如恐怖主义猖獗、生态环境破坏严重以及全球气候变暖导致“亚洲水塔”变化等。其中，“亚洲水塔”变化这一地区性甚至是全球性“共同命运问题”，最直接影响到的是喜马拉雅地区，尤其是喜马拉雅地区的东南端。通过揭示跨喜马拉雅地区当下所面临的“亚洲水塔”变化所导致的冰川后退、湖泊扩大、河流径流增大等最紧迫的共同命运问题，能够在跨喜马拉雅地区内激起命运共同体意识，从而携手应对和解决这一地区性公共难题。

未了，为了深化“一带一路”建设，建构跨喜马拉雅地区主义，并最终迈向跨喜马拉雅命运共同体，我们还拟提出以下三点倡议。

第一，批判殖民帝国中心主义，建构跨喜马拉雅地区主义。根据郁丹先生的看法，自殖民时期以来，跨喜马拉雅地区研究的范畴带有四种根本缺陷：一是西藏中心论，二是南喜马拉雅视角，三是英国殖民产物论，四是冷战思维对区域研究的定位。^① 可将此四种缺陷归结为三种思维定式：一是帝国主义视角，二是殖民主义视角，三是冷战思维定式。我们以比较地区主义为视角，建构跨喜马拉雅地区主义，首先要挑战或破除的就是这三种思维定式，即去帝国、去殖民和去冷战。^② 尤其是印度，需要卸下英

^① 参见郁丹：“序言——环喜马拉雅环境、生计和文化的连贯性”，郁丹等主编：《环喜马拉雅区域研究编译文集一：环境、生计与文化》，北京：学苑出版社，2017年，第3页。

^② 参见陈光兴：《去帝国——亚洲作为方法》，台北：行人出版社，2006年。

印殖民主义的负面遗产，积极参与跨喜马拉雅地区合作与治理。只有通过这种“三位一体”的解构，我们才能在跨喜马拉雅地区本土经验和知识基础上，建构一种符合地区实际的地区主义。

第二，超越国家中心主义，突显跨喜马拉雅地区主义。跨喜马拉雅地区作为一个整体性的地理单元，在近代以来民族国家的兴起过程中，被人为划分为不同的区块，归属不同的国家或地区。但其本身在经济联系、文化类型、种族人群和地理形态上，一方面具有一定的整体性和独立性，另一方面具有相当的杂糅性和流动性，因而成为一个跨体系地区单元。从地区尺度来看，只有突显跨喜马拉雅地区的主体性和中心性，我们才能在国家认同基础上，建构和培育起一种新的地区认同。

第三，突破“彼此中心，互为周边”的“自国中心主义”。周边命运共同体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键一环。跨喜马拉雅地区是我国与一些周边国家构成的一个整体区域。地区内的中巴经济走廊、中尼印经济走廊和孟中印缅经济走廊，是联通“一带”和“一路”的三大桥梁，对于建构周边命运共同体意义重大。然而问题是，“周边”应该如何界定？一方面，从中国本位视角来看，如果说地区两个国家的边界，是作为整体的“周边”的“内边”的话，那么周边的“外边”在哪里呢？这不是一个容易回答的问题，由此可能导致周边无边。另一方面，从“周边”国家立场来说，则我们所谓的“周边”国家其实才是“中心”，而中国则成为其“周边”国家。相邻各国与其都站在“我中心—彼周边”的立场彼此边缘化，不如将共同国界看做是各国“之间”的缝合线，从而将各国联结成一个整体性地区。由此，“多国边缘”变成的“地区中心”。此种立场和视角的转换，需要各国摒弃“自国中心主义”的定式思维，树立平等相待的主体间性意识。^①我们深知，要克服“自国中心主义”，建构跨喜马拉雅地区主义，在当下尽管有“跨喜马拉雅发展论坛”和“‘环喜马拉雅’国际合作论坛”的加持，但主要还是一种理论性尝试。尽管如此，为了避免造就一个最坏的地区世界，跨喜马拉雅地区各国人民仍需在理想性观念的指引下，为建构跨喜马拉雅地区主义，迈向跨喜马拉雅命运共同体一道努力。

^① 参见赵裴、姜锋：“试论区域国别学的研究主体与客体”，《外语电化教学》，2024年第4期。

Towards trans-Himalayan Regionalism: A Theoretical Attempt

Zhu Yuanshuai

The countries of the Trans-Himalayan region are close in geographical proximity, kinship, and cultural ties, with frequent political exchanges, active economic trade, and in-depth cultural exchanges. Building Trans-Himalayan regionalism is conducive to enhancing mutual understanding among countries in the region, promoting the alignment of their development strategies, enriching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sharing the fruits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and cooperation. Since 2015, China has initiated and hosted the “Trans-Himalaya Development Forum” and the “Trans-Himalaya Forum F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gradually transforming Trans-Himalayan regionalism from a conceptual advocacy into practical action. However, aside from one Indian scholar who has discussed this concept, no Chinese scholars have yet adopted it, let alone elaborated on it in depth. To bridge the gap between theory and practice, it is necessary to further reflect on Trans-Himalayan regionalism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Comparative Regionalism, “Belt and Road”, and the concept of a neighborhood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thus laying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 and methodological approach to building a Trans-Himalayan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India: Current Status and Challenges

Yang Lu

The Indian government has established a policy framework for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led by the Ministry of Electronics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guided by the National Transformation Agency. This framework focuses on data, semiconductors, and telecommunications while building an AI ecosystem. India has notable research achievements and specialized talent, alongside large-scale investments to enhance chip manufacturing and high-performance computing. Traditional businesses are rapidly digitalizing under government initiatives, while startups target niche markets. However, challenges in regulatory frameworks, data management, digital infrastructure, and talent supply hinder AI progress. This paper argues that India will accelerate AI regulation development, seek foreign support, and aim to lead in global AI governance.